《老子说了什么》之——

老子摆的什么“道”

■李德元

“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道德经”的开篇语,简单六个字,似乎成了千古箴言。古往今来,老子的后人我们的先人对这六个字给予了无穷的解释,争论了两千多年,越说越深奥,越说越玄乎。在我看来,是老子的后人我们的先人想多了,把老子的意思整复杂了。其实这六个字什么玄妙都没有,它就是老子在作《道德经》的开场白。“道可道,非常道”如果翻译成现代白话,应该是:“大家要我讲一讲道的问题,我可以讲一讲,但我要讲的道,与现在诸家百子通常讲的道不是一回事。”

那么,老子要讲的道是怎么回事呢?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对道的论述。

道,从字义上讲就是具有一定方向的路。《说文》有云:“道,所行达也,一达谓之道”。中国古代思想家把“道”引申为一个哲学概念,而赋予了“道”深奥的内涵。但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没形式逻辑,各家在使用“道”作为哲学概念时,却没有对“道”下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义,诸子百家,各说各话。比如:

《周易·系辞上》有云:“一阴一阳谓之道”。其语义是阴阳运行变化就是“道”,这里“道”应该作规律解。

《周易·系辞上》有云:“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从哲学意义上讲,所谓“形而上”是指无形而表现与形的存在,“形而下”是指具有一定形体的存在。究其语义,这里的“道”应该指的是思维活动或思维方法。

《论语·里仁》有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儒家的一种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孔子的“道”,指的是道德规范。

《中庸》开篇有云:“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这个性可以理解为人的本性,也可理解为事物的本质,尚可理解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率就是遵循的意思。其语义就是遵循人性的本来要求,遵循事物的本质要求,遵循事物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行事就是“道”。这里“道”应该指的是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自觉性。

荀子云:“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的强调的“道”是人世间的义理。

以上诸子所讲的“道”,都不是老子要讲的“道”,那老子要讲的“道”是什么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探究一下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道”的特征的描述。

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道”的特征有以下描述:

首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是说“道”是物质的,“道”在天地(地球)没有形成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而且道不是在一个早上就诞生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化才形成的。

其次,“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虽然是物质的,它却是恍恍惚惚的,说无又有,说实又虚,既看不清又摸不着,与“道”迎头相会,你也见不到他的头,跟随在“道”的后面,你也看不见他的尾。可是,在这恍惚之中,却揭示了宇宙与生命的法则,包容了天地万物。

其三,“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这是说“道”渊远幽深,传承着生命的奥秘和智慧。“道”虽寂静无声,寥廓无形,但是一个独立存在,有着自己的运行轨道,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其四,“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这就是说“道”虽然看不清又摸不着,却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天地万物都需要“道”的化育与衣养,才能够生存下去,而“道”对天地万物的索求从不推辞。“道”化育了万物,却不居功于万物,“道”衣养了万物,却不主宰万物。

其五,“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如果硬要给“道”画一个像,“道”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中空容器,它可以包容万物,而万物永远也不能将其填满;“道”就像渊源要多么深远就多么深远的大河,天地万物都似从这条大河中化育出来的;如果说“道”有颜色,那么“道”的颜色要多么清澈就多么清澈,清澈得好像没有颜色,似乎又有颜色。

其六,“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从这句话可以推测,老子虽然对“道”的特征作了上述描述,但“道”到底是什么,老子也没有想清楚。只是勉强给其命名为“道”。

根据老子对“道”的特征的描述,在二千多年前,要理解老子的“道”确实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当时的科学水平不能给我们提供理解老子的“道”的科学理论。站在今天的科学立场上,我们应该很容易理解老子的“道”,其所指向的就是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或地球在太阳系的轨道。

从宇宙起源学说我们知道,地球形成之前是太阳系中的一团星云,这符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描述。这团星云在一定的轨道上,周而复始的运行,这符合“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描述。地球的运行轨道在宇宙间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只是地球运动的轨迹,并没有一条实体的轨道。这符合“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的描述。

正因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或地球在太阳系的轨道,地球上才产生了适合于生命的宜居环境。有了这个宜居环境,地球上的生命才得以生,得以长,得以成。才能生生不息,延续相传,欣欣向荣。但这个宜居环境本身对生命却没有任何索取。这符合“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的描述。

地球上的依据环境产生了生命的条件。有了生命的条件,便产生了生命形式;有了生命的形式,生命才得以进化。正因为有了生命的进化,今天的地球才有了多样的生命种类,才能形成相生、相依、相克、相成的生命体系。宜居环境就是生命的源泉。这符合“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的描述。

二千多年来,学者在研究老子的“道”时,普遍认为老子所讲的“道”指的是自然的本源。而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地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生意盎然的星球,是由地球刚好处在太阳系的宜居带内。正因为地球处在太阳系的宜居带以内,地球上才能够出现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才能出现生命。也就是说,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或地球在太阳系的轨道是地球生命得以存在的根本依据,这个根本依据就是地球自然的本源。如果我们接受老子的“道”所指的是自然本源,则老子的“道”所指向的就是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或地球在太阳系的轨道。如果把这个具体位置或轨道与生命的关系抽象成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道”就是地球上一切生命关系的总和。

有人会说,你用现代科学来解析老子的“道”,是不是生拉硬扯。这不是生拉硬扯,哲学就是通过玄想来探索未知的。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只是为解释老子的“道”多提供一种选择。老子的“道”在老子概念中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已无法进行实证。我们只能依据各自的理解,而提出各自的命题,并不断地对这些命题进行优化,才有可能接近老子的原意表达。

首先,阐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需要给“道”界定一个断定性的概念。“道是哲学中最上的概念或最高的境界”(金岳霖《论道》);“道是总规律,是最高的真理,也是最真实的存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但二千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给“道”下过断定性的定义,没有界定“道”的具体内容,这是不应该的。作为中国哲学最高境界的“道”,作为最高真理的“道”,却没有断定性的定义,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品质的问题。中华民族的复兴从根本上讲是文化的复兴。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给“道”下一个断定性的定义,不能让“道”此类如此重要的思想概念永远处于“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篇》)的状态,这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也是坚持文化自信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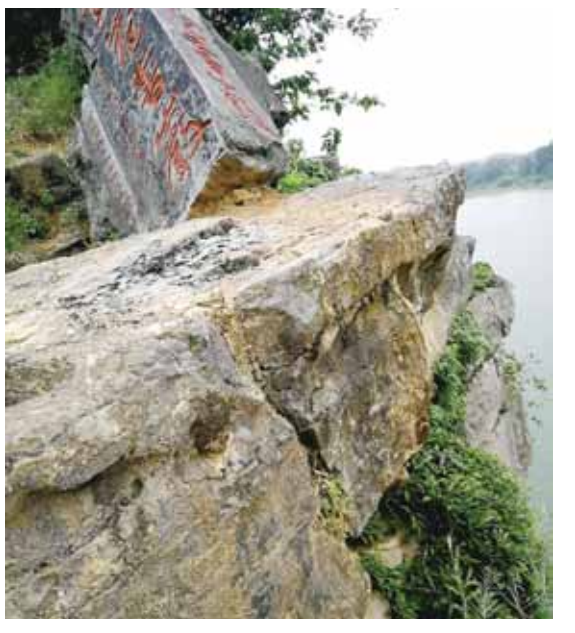
其次,阐扬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仰望星空”的智慧。

什么是“仰望星空”,用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的话说:“‘仰望星空’就是探索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等是如何形成、运作、变化的,即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其目的是如何‘征服’它们,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哲人们的眼光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事,主要是‘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仰望星空’好像只是西方哲人的权利。”而事实上,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开始了对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思考,老子为中国古代文化打开了一扇遥望科学的窗户,可惜的是老子的后人我们的先人没有接住,而使中国古代文化错过了走向科学的道路。我们今天之所以把老子的“道”定义“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或地球在太阳系的轨道,即地球上一切生命关系的总和”。就是要发掘中国古代思想家“仰望星空”的智慧,重新拾回中国古代文化中“征服”的基因,重新激发中华民族“征服世界”“超越自然”的血性,以“伟大”为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祁阳文昌塔和万卷书岩

■文/图 谭浩泉

祁阳文昌塔



万卷书岩

湘江在祁阳县城画了一个“L”形大弯,文昌塔和万卷书岩就坐落在湘江东岸,与鼎鼎大名的浯溪碑林隔江相望。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代,古人非常热衷于建文昌塔,以弥补本地文气不足,冀图多出文人才子,文运昌盛。不知道是不是文昌塔保佑了风水的缘故,祁阳崇文兴教的风气很盛,英才辈出,科举时代,全县进士及第就多达142人。

文昌塔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是省内仅有的四面抱厦式结构砖石塔。塔身坐东南朝西北,为七级八面楼阁。各层高度不等,各设四真四假共8,楣及各处神龛均有精细浮雕。石阶回环曲折,二、三、七层设外平台,有八方走廊,围以沙石栏杆,石栏上刻有鳌、虎的头形,其余设腰檐。各层兽头均口含一枚铜铃,遇风则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悠扬悦耳,传至很远。一层正门嵌“二龙戏珠”立体镂空浮雕石刻,上刻“文昌塔”三字,其余各层也均在内壁上嵌有对联、建塔记等碑刻。塔内有中心厅六层,均置神龛。铁铸约11吨重的宝葫芦、相轮塔刹镇顶。整座塔拱斗出檐,石栏石瓦,具有典型的明代风格。

在文昌塔下方不远处,就是矗立在湘江岸边的万卷书岩。天然巨岩层层叠叠,远看似书码放堆积。上有一倾斜巨石,刻有一代书家何绍基“万卷书岩”四个大字。湘水悠悠,危岩高耸,绿影婆娑,文风俨然,仿佛空气中都飘有翰墨香的味道!

《系统汉语》拾零之⑥

“我”的四种境界

■李 银

我戈　拒马　船桨　梭子

(资料图片)

古汉语中,表示“我”的字有四个:我、吾、余、予。

“我”,商代金文作[illegible],象当时的一种类似于戈的锯齿状兵器形,杀伐并能切割;如图即为出土的西周时的“我”,说明那时仍在使用。但很早便失去了本义,而作第一人称代词用。《尚书·泰誓》:“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意思是:我们武功强盛,军威飞扬,陈兵到边疆,消灭凶残的敌人。“我”既与武器有关,那种靠武力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看似不容冒犯,实则色厉内荏的面目昭然若揭;从今日的wǒ声里,仍能感觉到那种耀武扬威、厉声喝止对方不得靠近的凶态!

“吾”,西周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从口五声。“五”,商代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为两木交叉形;西周金文在中间添加了“十”或作“五”的二迭,指用许多交叉的木头摆在一起,这是一种路障,叫“拒马”,一般摆在路口或门前,禁止人马的通行。“口”指口头表达。因此,“吾”即自报家门以求通过之意。很早就跟“我”共用,《周易·中孚》:“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意思是说:树荫里有只仙鹤在鸣叫,小鹤也在应和着;我有好酒,愿与你一起分享。从wú声里,不难想见那种生怕得罪守卡人,而点头哈腰、唯唯诺诺,请求放行的媚态。

“余”,商代甲骨文作[illegible],桨的象形。小小的一片桨操纵在划船人手里,便可以优游自在地于浩瀚的水面上航行。音义同鱼(yú),意即象鱼一样在水里划动。《说文》:“语之舒也。”指语气的舒徐。表示从容、闲暇之意。因此,“余”的最初作第一人称,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经常出现,作“余、余一人”,似乎跟后来皇帝的称“孤”道“寡”差不多;秦始皇开始,则专称自己为“朕”,甲骨文作[illegible],即双手撑篙行船的意思,跟“余”如出一辙。一副信心满满、怡然自得的狂态。

“予”,商代甲骨文作[illegible],梭子的象形。梭子是织布用的重要机件。古代织布时,织布人通过左右两手的来回推送梭子,引导纬纱进入梭道,实现与经线的交织而成布幅。《说文》:“推予也。象相予之形。”指的就是梭子的来回推送,因此有授予、给与之意。“予”的音义很早就同“余”。《诗经·郑风·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描写一位女子周到地侍奉丈夫穿衣:黑色的衣服真合身啊,破了我就做件新的。虽然读音跟“余”相同,但那种平易、恬淡的热忱十分动人!是于忙乱之中,仍爽快应答的真态。

古人造字真是细致入微,生动逼真!同样是第一人称代词,不同的字,体现了四种不同的境界。因此,时代风气不同,自称便有不同。古人崇尚礼节,多尊人而卑己,因此在社交场合或公共场合,极少自称为“我、余”的,一般用“吾、予、愚、下官、鄙人、小可、小生、不才、卑职、晚生、在下、不肖、奴、老朽”等谦辞自称,否则会被大家讥为不懂礼仪。

《梦溪笔谈》卷十八就记载了唐代一位姓许的道士,他善于言谈,文采飞扬,但为人傲慢,跟人打交道时,不管对方是谁,都从不介绍自己的名字,一律自称为“我”,因此大家都讥笑他为“许我”。宰相贾魏公听说后,派人多次邀请他相见,他都不来。好不容易请来后,许我骑着驴就径直往丞相家走,看门的人拦住他说:“这是丞相府门口,就是丞相也得下坐骑。”许我说:“我没有什么要请求丞相的,是丞相要我来。若是这样的话,我离开就是了。”于是不下驴便自顾走了。看门人急忙追他,却没有追回来,只好回去告诉了丞相。贾魏公后来又让人请他来,他却再也不来了。这位宰相肚量还不错,叹息说:“许我一个市井百姓。因为他没有求人的地方,尚且不会因为势力而屈服于人,何况那些以道义为己任的人呢!”

这位许道士竟然因为自称“我”而惊动宰相,可见“我”不是那么随便就可以自称的。

发展到今天,人人平等,“我”已成常态,谁若再口口声声地谦称自己为“鄙人、在下”等,则会反被讥为迂腐了!而“吾、余、予”虽然不用,但其境界仍存于人心。从我内心来讲,还是喜欢“予”字,亲切而自然!

文化视点

诗词文化普及不能止于记诵

■宋春光

古诗词相关的图书、分享会、谈话活动等都备受读者青睐,这也是近年来古诗词热的一个缩影。而包括《中国诗词大会》在内的电视综艺节目的热播,正展现了人们对古诗词文化的热情。但若要避免古诗词文化成为“快餐文化”,使其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养读者的心灵,把握古诗词文化普及的方向并作有效的引导,是至关重要的。

古诗词文化的普及,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所谓“普及”究竟指向何处?目前来看,社会上对古诗词的弘扬,着力点主要在于记诵。古诗词文化的普及固然应包括记诵乃至创作,但仅停留在这些“技”的层面实则并非真正的普及。我们的社会既不需要“有脚书柜”,也不期望人人都成为诗人。古诗词及其传承有其自身的特性。作为“有意味的形式”,诗词所承载的是人的情感。而一首诗词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这是我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选择的结果,这些诗词中的“意味”也因此而包含了历史合理性。

其次,我们也应认识到,诗词中的这些“意味”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理解与体认中被不断丰富,从而不断生成利于社会发展的、深契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意味”。古诗词中的每一个意象与典故,所承载的都是人们的情感积淀与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吟诵古诗词的过程,其实也是对这些“意味”产生情感认同和审美体认的过程,将最终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诸如“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这些经典的诗词,它们各自虽有其不同的风格与历史文化语境,却往往蕴含着相似的主题: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对本真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情感的珍视。而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也正是因为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对于人生的思考与选择具有跨越古今的普遍性意义。因此,长期的吟诵与体会便会使这些诗词中的意蕴积淀到人们的文化心理中,对人的价值建构与心灵成长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古诗词文化普及所指向的,应是每位读者道德和情感的自觉能力的提升,而每一个个体人文素质的提升,也将为我们民族走向未来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记诵是我们体认古诗词的途径,以记诵为评判标准的文娱节目对于古诗词文化传播也确有其借鉴意义,但仅从记诵层面“普及”古诗词文化,其局限性是不言自明的。这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学者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来体认、解读古诗词的文化意蕴,为读者与古诗词之间架起有效的桥梁。

本报地址:衡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台路33号 邮发代号:41—18 邮政编码:421001 定价:每年328.00元 零售每份1.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衡广登字第0002号 广告中心电话:8247111 8243140 发行部电话:8223670 印刷:衡阳日报社印刷厂